

从历代著名唐诗选本 看李白杜甫诗歌的接受

申东城

【摘要】 历代唐诗选本选诗安排、序跋评论常可弥补诗话和文集不载的缺憾,颇有价值,但它们对于唐诗研究的非凡功用,往往被人们忽略。本文通过历代唐诗选本对李白、杜甫诗歌选录的梳理探讨,总结历朝历代对李、杜诗接受情况,即唐人较崇李,宋人较尊杜,明人李、杜并重,清人反思前人,大胆肯定杜诗之变。

【关键词】 唐诗选本;李白;杜甫;接受

【中图分类号】 I206 【文献标识码】 A 【文章编号】 1008-0139(2012)02-0019-7

“作诗非难矣,选诗难”^{〔1〕},诗歌选本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方式之一,始终为世人所重。其不仅关系到选诗者的才能和见识,而且可见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嬗变发展对收录作家作品的影响,它既保存了许多古典诗歌的原生态,又广泛流传并影响后人,唐诗选本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例。唐朝是古典诗歌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,历代唐诗选本很多,诸家选本见人见智,异彩纷呈。作

为唐朝诗国星空“双子星座”的李白、杜甫,唐诗选本更像一个个活化石,虽历经岁月风霜,但依然熠熠生辉,折射出历朝对于李、杜评价的诸多信息。

一、推崇李白的唐人选唐诗

唐人选唐诗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,不仅反映出选家们各自不同的选诗标准,而且呈现出唐代

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课题,《李白杜甫比较与唐诗嬗变研究》,编号:LB08-12. 阶段性成果。

〔作者简介〕 申东城,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、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,四川 乐山 614004。

总体时代风貌和审美趋向。明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记载唐人选唐诗共有50多种,惜多亡佚。现存的有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,今人傅璇琮编撰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搜辑共13种,较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,增加了初唐许敬宗等撰的《翰林学士集》、崔融编的《珠英集》中唐李康成的《玉台后集》。现据《唐人选唐诗十种》所存选本,参之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,将李、杜诗歌入选数量(单位:首)列表如下:

唐人选唐诗种类	作家作品	
	李白	杜甫
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	34+9#	0
《河岳英灵集》	13	0
《国秀集》	0	0
《篋中集》	0	0
《中兴间气集》	0	0
《御览诗》	0	0
《极玄集》	0	0
《又玄集》	4	7
《才调集》	28	0
《搜玉小集》	0	0
《玉台后集》	0	0

十一种唐人选唐诗中,李白入选四种(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、《河岳英灵集》、《又玄集》、《才调集》)共88首,杜甫入选的仅一种(《才调集》)7首。结合王维入选五种(《河岳英灵集》15首、《国秀集》7首、《极玄集》3首、《又玄集》4首、《才调集》2首),共31首,王昌龄入选五种(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17首、《河岳英灵集》16首、《国秀集》5首、《又玄集》1首、《才调集》5首),共44首比较,亦可见杜甫在唐人选唐诗中的不被重视。

唐诗选本多选李诗,少选或不选杜诗,有其深层原因,比如选家选诗标准,当时诗坛风尚,社会政治影响,诗歌自身发展变化。敦煌残卷本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共选李昂、王昌龄、邱为、

陶翰、李白、高适六家,总选李白诗43首,居诸家榜首。李白是唐代乐府大家,书中录李白古乐府24首,并有意单独编为一类,可见李白乐府在当时就已流行,这既符合李白诗歌成就实情,也为后世重视学习李白乐府奠定了基础。在入选六家中,唯有李白诗一首未遗失,李诗在当时受人欢迎程度可想而知。李白生前作品就倍受世人青睐,多有崇拜者,王屋山人魏万就曾千里迢迢,不辞劳苦,从河南长途跋涉到江浙寻找、结识李白,据魏万说李白刚出川时,在江陵遇见著名道士司马承祯,受其褒奖后激情写下的《大鹏赋》,当时天下“家藏一本”,这年李白刚26岁左右,李白成名之早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。现存杜甫1400多首作品,约有1300首写于安史之乱后,不录杜诗原因似乎很明显。但杜甫在《进雕赋表中》称自己“自七岁所缀诗笔,向四十载矣,约有千余篇”^[2],不仅未入选敦煌残卷本《唐写本唐人选唐诗》,而且编选时限为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载的《河岳英灵集》,选24位作家230多首诗歌,也未见杜诗。敦煌残卷本“似为抄录”(傅璇琮语),恐像敦煌曲子词一样,出于民间传抄。李白高选,杜甫不录,更能说明李、杜诗在时人(尤其百姓)心中的地位高下。

纵观写诗褒扬杜诗的唐人,在杜甫生前仅有三人:郭受“新诗海内流传遍,旧德朝中属望劳。……春兴不知凡几首,衡阳纸价顿能高”(《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》);韦迢“相逢缆客船,大名诗独步”(《潭州别杜员外院长》)^[3];任华“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,吾怪异奇特借问,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。……曹、刘俯仰惭大敌,沈、谢逡巡称小儿。昔在帝城中,盛名君一个,诸人见所作,无不心胆破”(《杂言寄杜拾遗》)^[4]。仇兆鳌注在郭诗题下注:“公(杜甫)必先有诗寄郭,故受作此以答。”韦迢写此诗同时,杜甫有诗送别,亦系唱和类。从其唱和角度,郭诗、韦迢的赞颂多少有交往中的惯常回答、奉承之嫌。至于任诗,多为后人诟病,考其为伪作。也即杜甫生前“百年歌自苦,不见有知音”(《南征》)。

与敦煌残卷本的百姓传抄不同,《河岳英灵集》与选者殷璠的诗学思想关系密切。殷璠虽赞美盛唐诗“声律风骨始备”,强调为诗要“既闲新声,复晓古体,文质半取,风骚两挟”,并说“不可不知也音律”,但他对“专事拘忌,弥损厥道”之诗尚多有不满,从而提出“但令词与调合,首末相称,中间不败,便是知音”^[5],可见其选诗更重风骨和古调。李白作诗重古体,多古调,《古风五十九首》多从陈子昂《感遇诗》而来,殷璠选诗标准与陈子昂、李白诗歌主张一脉相承,故选录李诗高达13首。而杜诗多重律体,喜欢苦吟,追求技巧变化,不被殷璠重视已属自然。这里面不仅有个人爱好,而且折射出安史之乱前,李白复古革新,是盛唐时代的代表。

后蜀韦毅《才调集》选诗重视“韵高而桂魄争光,词丽而春色斗美”^[6],故韦选李诗28首,不选李飘逸自然、雄奇奔放之作,多选其写妇人之诗。

《才调集》是现存唐诗选本中选诗最多的,它多选中晚唐律诗,虽韦毅在叙中称赞杜甫,但却未选录律诗大家杜甫,而李白虽不擅长律诗,但却是入选诗量最多的盛唐诗人,也是全书选诗超过二十首的八家之一,这与韦毅偏居安逸蜀地,喜近体艳情诗,及中晚唐诗歌发展趋向有关。杜甫艳情诗和写女性诗篇几无,故不选。而李白集中还有此类作品,正如舒王讥讽李诗“词诗十句,九句言妇人、酒耳”^[7],虽言之有过,但却暗合了韦毅的审美趣味,入选诗歌放弃他类,仅录妇人之诗就不足为奇了。这既反映出李、杜诗歌取径之别,也从侧面透露出李白在蜀地和五代仍有很高的威望。

二、膜拜杜甫的宋人唐诗选和承宋启明的元代唐诗选

宋人对杜甫的态度,分三个阶段:北宋前期白体、西昆体、晚唐体流行,学杜的并不多;真正膜拜杜甫的高潮在北宋至南宋中叶阶段,江西诗派的崛起,使得杜诗深入人心;而南宋后期,有识之士力矫“江西”流弊,杜甫的光芒日渐暗淡。不过,总观全宋,大多数诗人都是以杜甫为师法对

象的,崇杜堪称宋人学唐的主流,而宋人选唐诗恰很好地体现出这种诗学思潮。

王安石《四家诗选》选录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欧阳修四家诗歌,其将杜甫排在首位,将李白放在臧斋闲览云:“王荆公编杜、欧、韩、李四家诗。或问公云:‘子编四诗,以杜为第一,李为第四,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子美耶?’公曰:‘太白歌诗,豪放飘逸,人固莫及,然其格止于此而已,不知变也。至于子美,则悲欢穷泰,发敛抑扬,疾徐纵横,无施不可。……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,而后来无继也。元稹谓兼人所独专,斯言信矣。’”^[8]王安石这样安排,一方面与他师法、尊崇杜诗关系密切,如“予考古之诗,尤爱杜甫”(《杜工部后集序》),“荆公诗得子美句法”(《唐子西语录》),“安石……皆步骤老杜所得。”(清吴之振《宋诗抄》);另一方面荆公是政治改革家,他与杜甫对诗歌的经世致用和写实精神是相通相承的。北宋虚外实内、冗军冗政、积弱积贫,荆公崇杜,实是北宋中叶士人忧国忧民情怀的外现。有意思的是,这些人抬高杜甫的同时,总想用李白作比,故而扬杜抑李的思想,也随着对杜甫的膜拜而迅速滋长,如苏辙就曾批评李白诗歌“华而不实,好事喜名,不知义理之所在”^[9],赵次公亦曾比较李、杜优劣曰:“李、杜号诗人之雄,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,神仙虚无之说,亦何补于教化哉!惟杜陵野老,负王佐之才,有意当世,而肮脏不偶,胸中所蕴,一切写之以诗。”^[10]

据笔者统计,《瀛奎律髓》选李白11首诗歌,虽对李白也极力褒奖,如卷首陈子昂《度荆门望楚》诗后附评论云李白等人“律诗不出则已,出则亦足与杜甫相上下”,并称赞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等11人成就了“唐诗一时之盛”^[11]和伟大,但李白入选诗量较杜甫总选诗275首实在太少。方回在具体选诗评语中,虽有“自汉《天马歌》以来,至李、杜集中诸马诗始皆超绝”^[12]的评论,但在杜与李等唐人比较时,他崇杜思想昭然,如“凡学诗……七言律不可不老杜也”^[13],“老杜诗为唐诗之冠”^[14],“其(杜诗)为变体之祖”^[15]。方回

在有些诗歌后评语中,直接将李白、杜甫优劣作以比较,极力赞扬杜甫,认为杜超过李白,如评杜甫《登岳阳楼》:“岳阳楼天下壮观,孟(浩然)、杜(甫)二诗尽之矣。”而在李白《秋登宣城谢眺北楼》诗后说:“太白亦有登岳阳八句,未及孟、杜。”^[16]

若说方回在元初编选的《瀛奎律髓》继承了宋人学杜之风,奠定了宋诗的承唐地位,那么元末杨士弘的《唐音》选本,则是元人崇唐的最终产物,是第一本以盛唐为宗的唐诗选本,并直接开启了明人推崇盛唐、并尊李杜、审音辨体、源流正变的诗学风潮。

《唐音》分“始音”、“正音”、“遗响”三部分。“始音”、“遗响”不分体。“正音”六卷是全书重点,按诗歌体裁编选。杨氏以盛唐之音为正,为理想的唐诗美学范式,以“遗响”体现音律之变,并认为不同体裁有不同“正”的具体要求。遗憾的是杨氏没选李、杜诗,他在该书“凡例”中解释为“世多全集,故不及录”,结合其自己在序中所说:“诗莫盛于唐,李、杜文章冠绝万世,后之言诗者,皆知李、杜之为宗也。”可见杨士弘是将李、杜诗歌作为唐诗巅峰看待的。而真正以选本形式,全面实践南宋严羽宗盛唐、尊李杜诗学理论,继承杨士弘等元人崇唐思想,并纠补杨氏选本不足,从而完全奠定李、杜千古并重基石的,还需明人高棅《唐诗品汇》来完成。

三、李、杜并尊的明代唐诗选

明初高棅继承了《唐音》的宗法盛唐、正变唐诗、审音辨体、分体类编、四唐划分等多种合理成分,并进行了合情合理的新变。四库馆臣就说:“高棅《唐诗品汇》即因其(指《唐音》)例而稍变之。”^[17]胡震亨亦评曰:“高廷礼巧用杨法,别益己裁,分体以统类,立九目以驭体。”^[18]高棅回顾前人唐诗选本,对它们多有不满,唯心服杨士弘《唐音》能“得唐人三尺”,但对杨氏“李、杜大家不录”等选录情况,“每一披读”,皆要“叹息”。故《唐诗品汇》纠补杨氏之偏,让诗歌“神

秀声律,粲然大备”正多变少的李白,始终端坐于盛唐段最高级别的“正宗”品;因“众唐人是一样,少陵是一样”^[19],杜诗异于唐人而起了变化,已是正变相半,高棅又在盛唐段为杜甫一人专设“大家”品。高棅推尊李、杜如斯,可见一斑,更难得的是,《唐诗品汇》全书以“四唐”分期为经,以“九品”品第为纬,辅以唐诗各种体裁,通选全唐,点面结合,纵横交织,形成有条不紊的唐诗发展网状结构,动态呈现出以李白、杜甫为并肩双星,王、孟、高、岑等人环拱、羽翼,并以盛唐诗为标准的文学史观。“终明之世,馆阁宗之”^[20],其对明清唐诗选本、唐诗研究、诗学思想等影响深远。

李攀龙“唐诗选”就是全取《唐诗品汇》而成,笔者统计其总选唐诗736首,入选作家、作品、选目顺序基本沿袭《唐诗品汇》而不变。继高棅等先贤泛滥崇唐复古思潮,和“前七子”提出“诗必盛唐”口号之后,作为“后七子”代表人物的李攀龙,也力倡盛唐诗。李氏所选盛唐诗总465首,初唐诗129首,中唐诗99首,晚唐诗23首,盛唐诗占选诗总量的63.18%,其中选录诗量最多的诗人仍是李白和杜甫。李攀龙的这种浓烈的盛唐李、杜情结,是明中叶士人心态的典型代表,其与宋严羽、元杨士弘、明《唐诗品汇》标举盛唐“格调”、并尊李杜思想一脉相承。

至于明末“一遵《品汇》之例”的唐汝询《唐诗解》,更秉承了高棅、李攀龙宗盛唐、尊李杜的选诗宗旨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《唐诗解》云:“是书取高廷礼《唐诗正声》、李于鳞《唐诗选》二书,稍为定正,附以己意,为之笺释。”^[21]笔者统计,该选五古选李诗54首,杜诗40首;七古收李诗24首,杜诗27首;歌行长篇、骚体李诗各入选1首;五绝录李诗20首;七绝选李诗34首;五律选李诗30首,杜诗40首;五言排律选杜诗13首;七律录李诗6首,杜诗36首。李、杜各体诗作的选定、安排,基本符合二人擅长诗体的实情,总选李白诗167首,杜甫诗138首,李、杜诗歌仍然是全书作家中选录最多的,这正是明人标举盛唐、并尊李杜总

体心态的准确再现。

四、总结反思前人、大胆肯定杜甫的清代唐诗选

明人崇唐太过,很多人机械模拟盛唐诗歌,乏情少韵,明选本并尊李、杜既有师承原因,也是明人尊唐复古思潮所致。若说明代人并尊李、杜尚有矛盾心里,他们舍弃杜甫而不能,拿起后感到又与李白代表的唐诗正宗有别,他们已经看到的杜诗之变,但又不能完全认可这种变化,如高棅在对李、杜品目安排时的煞费苦心就是明证,那么喜欢冷静总结反思前人的清代人,在对待杜甫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,他们不再遮遮掩掩,而是从诗歌嬗变发展的层面大胆肯定杜诗之变,肯定杜诗对中晚唐诗乃至后代诗史的开启和转折之功,肯定杜诗之变对后代诗坛的巨大影响和作用,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就是其中典型代表。

清代的唐诗选本经历了一个由王士禛纠弊而又跑偏,沈德潜起而矫之,蘅塘退士继承沈氏,王尧衢融汇清初中期诸选家观点宗唐本心,翁方纲调和前人唐宋之争,调和诸家之说的历程。其间经历李杜由受冷落,到受重视,尤其杜甫被大力认可的过程。这貌似又回到了宋代或方回的崇杜老路上,其实不然,清人对杜甫的肯定,更多的是对宋、明人唐宋之争、李杜选录得失冷静反思总结的结果,是跳出李、杜优劣之争后,审视几千年诗歌纵向发展流变,从诗学史角度,对杜诗变化的认同。

清初,以诗坛盟主钱谦益为代表,针对明代宗唐流弊,渐渐兴起了宋诗热。康熙诗坛领袖王士禛就始学宋,后宗唐。王士禛为唐诗选本大家,他一生编选过四部唐诗选本,按编选时间顺序分别是:《唐诗七言律神韵集》(康熙初,王氏早年编,现存残本。)、《唐贤三昧集》(康熙27年(1688)编,王氏50岁时编。)、《十种唐诗选》(约与《三昧集》同时或稍后编成)、《万首唐人绝句选》(成书于“康熙戊子”,三年后王氏去世。)。另外,王士禛还编有《古诗选》,其间也有唐诗选。若说《神韵集》残本不能尽展王氏选诗

真貌,其中杜甫选诗也不甚确然,那么《三昧集》中就可真实尽显王氏对待李、杜诗歌的观点。

《三昧集》是王氏神韵说的典型外现,其主王、孟等山水清音,肯定的是严羽对唐诗“优游不迫”的阐释,认为王孟的恬淡闲远神韵是唐诗主体风貌的代表,从而未选李、杜诗。王氏自己解释不录李、杜的原因,是模仿王安石《唐百家诗》体例,因李、杜“篇目繁多,集又单行”^[22]。然赵执信“阮翁酷不喜少陵,特不敢显攻之”^[23]之言,和李重华《贞一斋诗说》所记的王氏对杜甫的偏见不满:“近见阮亭批抹杜集。乃知今人去古,分量大是悬绝,有多少矮人观场处,乃正昌黎所谓‘不自量’也”^[24],及门人翁方纲对王士禛不选李、杜的解释:“渔洋选《唐贤三昧集》,不录李、杜,自云仿王介甫《百家诗选》之例,此言非也。先生平日极不喜介甫《百家诗选》,以为好恶拂人之性,焉有仿其例之理?以愚窥之,盖先生之意,有难以语人者,故不得已为此托词云尔。先生于唐贤,独推右丞、少伯以下诸家得三昧之旨,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,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。若选李杜而不取其雄鸷奥博之作可乎?吾窥先生之意,顾不得不以李、杜为诗家正轨也;而其沉思独往者,则独自冲和淡远一派,此固右丞之支裔,而非李、杜之嗣音矣。”^[25]皆可见王氏对李、杜诗,尤其杜诗的真实态度和看法,虚伪矫饰终究掩不住真相,个人喜好才是他不选李、杜的深层原因之一。

沈德潜编有《唐诗别裁集》、《明诗别裁集》、《清诗别裁集》、《古诗源》等著名选本,尤其《唐诗别裁集》是其诗学观点的重点所在,他对之非常看重,晚年还进行过重订。沈氏上承明人对唐诗源流正变,并特别崇尚儒家诗教说,他认为性情之正是衡量诗人最重要的标准,只要诗人情正,哪怕像杜甫诗歌那样起了变化的,仍然是需要大力赞美的对象。《唐诗别裁集》共20卷选诗1928首,其中入选杜甫、李白诗较多,五古(53首)、七古(58首)、五律(63首)、七律(57首)等体裁,尤以杜诗选录为冠,并称赞李、杜七言诗是“七言楷模”的“大备”^[26]。《别裁》选本取名

也源于杜甫《论诗绝句》的“别裁伪体亲风雅”诗意,沈氏对李、杜,尤其对杜甫的重视昭然可见。

沈氏纠补王士禛对杜甫的偏见,极力赞扬杜诗:“议论开辟”、“尽掩诸家”;“独开生面”、“超然拔萃”^[27];“学问博,力量大,转接无痕”、“千古以来,让渠独步”^[28];“气局阔大,使事典切”、“错综任意,寓变化于严整之中”、“足凌踈千古”^[29],沈氏认为李白、杜甫诗歌的宏伟壮阔方是唐诗尤其盛唐气象的主要体现,而不是王士禛所主张的王孟等人倡导的“空山无人,水流花开”^[30]。不过,沈氏并非全部否定王士禛的观点,他对“新城(王士禛)所取,亦兼及焉”,其在《重订唐诗别裁集序》时云:“先审宗旨,继论体裁,继论音节,继论神韵,而一归于中正和平。”^[31]他其实是将明人审音辨体、源流正变的格调说和清王士禛的神韵说融合了,并彻底抛却了明格调说伸正绌变之弊,其集中体现在对杜诗的态度上。

沈氏之后,清代唐诗选家审视前人,视野更加宽广开阔。约成书于雍正六年(1728)的王尧衢《古唐诗合解》,就是融合清初中期诸家诗学观而自出机杼的诗歌合选,尤其继承了叶燮《原诗》创新求变、穷本知源的诗史嬗变观。王尧衢复古但不薄今,其强调既要学古人,又要“静听山水之清音,以豁其胸襟,自出其才识胆力”,假以时日,方可达到“天机流动”^[32]。尧衢不仅为法自然之诗折服,视之为极品,而且非常重视诗法和技巧,而这两类诗歌恰以李白、杜甫为最,故《合解》所选,尤重李、杜。全书选录132人,杜甫选诗78首居冠,李白第二,入选54首,王维第三43首,岑参32首,高适、孟浩然各17首。尧衢既宗盛唐和杜、李,又兼顾王、孟、高、岑等不同诗风,较清前期诗学主张更加圆通融达合理。

清代合选诗歌的著名选本,还有翁方纲的唐宋诗合选本《七言律诗钞》和《小石帆亭五言诗续钞》。翁方纲取杜甫诗歌《丽人行》“肌理细腻

骨肉匀”^[33]之意,而自成“肌理说”。《七言律诗钞》视杜甫为唐代乃至齐梁以来的第一人,称“有诗人之诗,有才人之诗,有学人之诗。齐梁以降,才人诗也;初唐诸公,诗人诗也;杜则学人诗也。然诗道至于杜,又未尝不包括诗人才人矣”,翁氏指出杜甫诗下传为韩愈诗,续传为王安石、苏轼等宋人诗,并认为他们皆继承了《诗经》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^[34]。这样就使得唐、宋诗歌一脉贯通,并为它们上继风雅正声找到归宿。至于乾隆29年(1764)成书的蘅塘退士《唐诗三百首》,远承高棅《唐诗品汇》,近秉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,仍然以李、杜为尊,但杜甫选诗总39首,高于李白的29首,可称清代对杜甫大力认可主流的余波了。

结语

历代唐诗选本众多,孙琴安《唐诗选本提要》就收录有600种之多。有的唐诗选本,如李攀龙《唐诗选》、王士禛《唐贤三昧集》等,早在清代就曾被翻刻、流传到国外,影响很大。唐诗选本蕴含的文学价值非常丰富,它不仅可见历代诗人对学习“四唐”哪段诗歌的歧见,和唐、宋诗优劣之争,而且不同社会政治的隆兴风会、地域风尚、诗学思潮、选家的不同选诗标准,及诗歌的自身发展变化规律等,皆深深地影响到人们对唐代作家作品的认识、态度和看法。历代唐诗选本选诗安排、序跋评论,常可弥补诗话和文集不载的缺憾,颇有价值,如李、杜诗歌在唐至清代的接受情况,李、杜孰优孰劣之见,甚至人们对李、杜诗歌风格、特点、差异的认识等,都可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找到答案,而这些选本对于唐诗研究的非凡功用,往往被人们忽略。通过历代唐诗选本对李、杜诗的选诗安排,可见各朝代人们对李、杜的接受情况:唐人较崇李,宋人较尊杜,明人李、杜并尊,清人跳出前人窠臼,大胆肯定杜诗之变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(清)魏宪.诗持三集自序[M].康熙十年枕江堂刻本.
- [2] (清)仇兆鳌.杜诗详注:卷24[M].中华书局,1979.2172.
- [3] 仇兆鳌.杜诗详注:卷22[M].1982,1995.
- [4] (宋)计有功著,王仲镛校笺.唐诗纪事校笺:卷22[M].巴蜀书社,1989.560.
- [5] [6] 傅璇琮.唐人选唐诗新编[M].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6.107,108,691.
- [7] (宋)释惠洪.冷斋夜话:卷五《舒王编四家诗》,见金涛声、朱文彩.李白资料汇编(唐宋之部)[M].中华书局,2007,229.
- [8] (宋)陈正敏.遁斋闲览[M].杂评.涵芬楼说郛本.
- [9] (宋)苏辙.栾城第三集:卷八[M].杂说九首.诗病五事.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
- [10] (宋)赵次公.杜工部草堂记.“金编本”395.
- [11] [16] 瀛奎律髓:卷1[M].登览类.2,9.
- [12] 瀛奎律髓:卷27[M].着题类.房兵曹胡马诗后评语.1152.
- [13] 瀛奎律髓:卷47[M].释梵类.涪城县香积寺官阁诗后评语.1735.
- [14] 瀛奎律髓:卷1[M].登览类.陈与义.与大光同登封州小阁诗后评语.42.
- [15] 瀛奎律髓:卷26[M].变体类.杜工部.九日诗后评语.1138.
- [17] 四库全书总目[M].2634—2635.
- [18] 胡震亨.唐音癸签:卷31[M].集录二.326.
- [19] (明)高棅.唐诗品汇[M].历代名公叙论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.12.
- [20] (清)张廷玉等.明史:卷286[M].中华书局,1974.7336.
- [21] 四库全书总目[M].唐诗解提要.2712.
- [22] (清)王士禛.师友师传续录[M],王夫之等.清诗话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.152.
- [23] (清)赵执信.谈龙录,清诗话[M].313.
- [24] (清)李重华.贞一斋诗说,清诗话[M].938.
- [25] (清)翁方纲.七言诗三昧举隅,清诗话[M].290-291.
- [26] (清)沈德潜.唐诗别裁集:凡例[M].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.
- [27] 唐诗别裁集:凡例[M].3.
- [28] 唐诗别裁集:卷2[M].55.
- [29] 唐诗别裁集:卷10[M].343.
- [30] 沈德潜.说诗碎语[M].清诗话[M].557.
- [31] 沈德潜.重订唐诗别裁集序[M].4.
- [32] (清)王尧衢.古唐诗合解序[A],单小青,詹福瑞点校.唐诗合解笺注[C].河北大学出版社,2004.
- [33] 仇兆鳌.杜诗详注.卷2[M],第156页.
- [34] 翁方纲.七言律诗钞.凡例[M].清乾隆四十七年翁氏复初斋自刻本.

(责任编辑 彭东焕)